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

第48辑

红军长征在四川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编

ICHUANWENSHIZILIAOXUANJI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

(第48辑)

——红军长征在四川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编

顾 问 秦玉琴 杨海清 彭柏林
主 编 罗 彤
副主编 钟 钢
编 委 (按姓氏笔划)
 许志强 李学明 莫世行
 秦安禄 梁守勋 席晓艳
执行编辑 蒋 巍



目 录

巴 中

- 1、采访通江女红军李玉南 白瑞雪、甄颖 (2)
- 2、姐姐背弟走长征 白瑞雪、甄颖、夏溱 (5)
- 3、陈金森参加红军 平昌县政协 (13)
- 4、女红军张廷福的回忆 蒋兴权 夏 溱 (15)
- 5、王树声尸场湾歼敌记 张奎元 张天华 (18)

达 州

- 1、红军打绥定府的回忆 牟正杰 (22)
- 2、雷音铺反击战 杨复秋 (27)
- 3、陈再道同志指挥我们打仗 刘海扬 (29)
- 4、红军进达城前后 郑思祥 (33)
- 5、悠悠故人情 李开芬 (35)

泸 州

- 1、营盘山上橘子红 罗 通 (39)
- 2、古蔺地下党组织接应红军长征 何世红 (43)

- 3、在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的艰苦岁月 …… 李桂英 (49)
- 4、回忆参加红军前后 …………… 陈万明 (55)
- 5、红军除霸分盐记 …………… 杨俊书 何世红 (58)
- 6、红军盆 …………… 杨玉清 何世红 (64)
- 7、一个留在古蔺的红军自述 …………… 罗 涛 (67)

宜 宾

- 1、红军长征在兴文 …………… 杨文字 (70)

南 充

- 1、红军长征在阆中 …………… 马玉书 (82)
- 2、三过雪山草地 …………… 肖里鹏 (86)
- 3、巍巍灵宝山 …………… 张仕政 (89)
- 4、营山籍红军的悲壮历程 …………… 刘星耀 (97)

凉 山

- 1、红军长征过冕宁的前前后后 …………… 陈野草 (106)
- 2、从西昌坝子到安顺场 …………… 文 彬 (113)

雅 安

- 1、用生命和鲜血抒写人生 …………… 孙 罡 (122)
- 2、地下党员席懋昭在灵关 …………… 陈 敏 (125)
- 3、一双喜鞋 …………… 罗新华 (129)
- 4、一枚银币 …………… 陈 敏 (132)

- 5、兄妹相会泪花流 董耀君 (134)
 6、茶乡情思 韩廷湘 罗新华 (143)

绵 阳

- 1、红军长征过绵阳简述 江瑞炯 (147)

广 元

- 1、火烧寺之战 广元市政协文史委 (156)
 2、红军攻克剑门关 陈 康 (159)
 3、回忆剑阁会议 余洪远 (171)

阿 坝

- 1、红军在理县薛城的日子 李红建 (175)
 2、红军在马尔康的活动情况 余 斌 (181)
 3、父亲安登榜参加红军始末 安本钦 (186)
 4、父亲参加红军前后的回忆
 马平山 马平章 李 智 (195)
 5、红军进羌寨 何雨农 (203)
 6、我的一段经历 塔尔平 崔先友 周礼富 (206)
 7、打骑兵歌 潘振武 (213)
 8、雪山草地的红军大学 王 波 (217)
 9、回民独立连的战斗生活 马显华 (228)
 10、女红军战士杨秀英的自述
 王乾联 牟 清 (230)
 11、我在红军队伍四年 熊吉武 安本钦 (233)

- 12、一位老红军对长征历程的追忆
..... 肖正朝 肖子荣 (237)

甘 孜

- 1、红军长征进驻道孚前后 钟 平 (249)
2、红军长征在稻城 稻城县政协 (254)
3、红军长征在理塘 李文瑄 (257)
4、红六团过泸定 文有仁 (262)
5、参加脚乌苏维埃政权的回忆 尹正康 (266)
6、耳闻目睹红军在化林坪的战斗 倪德元 (271)
7、我所知道的红军在石门坎的战斗 郑世杰 (275)
8、红军在康定麦崩 康定县政协 (278)
9、忆丹巴藏民独立师 金世析 (282)
10、回忆波巴政府的日子 王寿才 (289)

巴中篇

采访通江女红军李玉南

白瑞雪 甄颖

通江是红军入川第一站，川陕苏区首府。当年，通江人口23万，有6.8万人参加了红军和支前组织，5万人牺牲。

李玉南是我们在这片红色土地上采访的最后一个老红军。全白的头发，笑起来弯弯的眼睛，88岁的李玉南仿佛只是邻家的慈祥老奶奶，与当年的轰轰烈烈无关，与几十年人生跌宕无关。

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来到通江。当红军队伍从小镇沙溪坝走过，街边围观的人群中一个叫李玉南的放牛女娃动了心，“咦，红军还有女兵呢！”想起父亲讲过的《西游记》里有个“女儿国”，她新奇不已。

她当即报名参军，换下竹壳做的“尖尖鞋”，穿上了圆口布鞋。“真的像个女儿国！”红四方面军有不少女战士，与李玉南过去大多为童养媳的女伴们不一样，她们都特别独立，同男兵一起训练、打仗。在第一次领到了部队发的布票子军饷后，李玉南也像别的女兵那样，把交完团费后剩下的钱用来买了牙膏和肥皂。这是她第一次用这样的“奢侈品”。“第一回刷牙没啥好味道，怪怪的。”

李玉南没有文化，但嗓门大，记性好，胆子大。半年后，17岁的她已是川陕少共妇女部长和少年先锋队总指挥。“那个时候没有电喇叭哦，但每回我一讲话，大家都听得到！”李玉南说

自己很厉害,到县里检查工作的时候,如果工作没做好,她会毫不犹豫地给对方两个耳光。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还乡团”把李玉南的父母赶出家门。屋檐下露宿的父亲,一夜大雨后活活冻死,母亲只好四处乞讨为生。这些不幸,李玉南直到解放后回到老家才知道。

“爬雪山过草地又累又困,但不敢睡觉,害怕一睡着就醒不来了。”于是李玉南向战友要来了烟酒——喝酒吃辣椒御寒,抽叶子烟提神,以至于后来患上了咽炎。“喝酒抽烟都是没办法的办法,我其实根本就不行的。”李玉南说,在她解放后回到通江当民政科长的时候,有一次陪同前来参观烈士陵园的客人吃饭,才喝了一点酒就醉了,晕乎乎地像在空中一样,“站也不是,坐也不是”。

也是在三过草地的途中,李玉南落下了妇科病。行军累了,战士们就背靠着背、垫一把草坐在地上。“水很快就渗出地面把草打湿了,不管你怎么换地方,都是坐在水里。”环境的艰苦破坏了女性的生理周期,一年多的长征中,李玉南的例假停止了,直到抵达延安一段时间后才恢复。”我们好多女兵都是这样的,那个年代,很正常!”

长征路上,李玉南还学会了跳舞,而且是“一男一女两个人拉在一起”的那种交谊舞。“我们学苏联,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宣传队的任务中,唱歌跳舞同打仗一样重要。她还是个好枪手,手枪、长枪都用过,到现在看电视也总喜欢看激烈枪战的镜头。在甘肃境内的一次战斗中,李玉南在牵马运送伤员途中被弹片擦伤。撩开茂密的白发,头上的伤疤至今清晰,李玉南却不当回事:“那点伤,算啥!”

长征结束后,李玉南幸运地留在了延安,并且被送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我是6个月就毕业的大学生!”老人骄傲地说。

(李玉南简历:四川通江人,1926年出生,1932年参加红军,3年后参加长征。曾任川陕少共妇女部长、中央剧社团委书记、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队指导员等职。1949年回到家乡四川通江,任通江县政科副科长、科长等职。20世纪80年代开始享受离休干部待遇。)

姐姐背弟走长征

白瑞雪 甄 颢 夏 溱 整理

金秋的季节，早起的人们在田间忙碌。满山的野菊花吐露馨香，山风吹得晨雾缥缈缈缈。

中央电视台记者、巴中红色讲述摄制组走过长长的一段山间公路，路旁绿树丛中一院瓦房，就是邓秀英的家。

姐姐邓秀英，弟弟邓玉乾，并排坐在一根长凳上。两人都是1米50出头，五官极其相像。邓秀英满口无牙，系着洗得发白但干干净净的围裙；邓玉乾一身蓝色长袍一顶旧毡帽，腿脚因为多年的风湿病不大灵活。很难想象，半个多世纪前，13岁的姐姐背着6岁的弟弟走上了漫漫长征路。

那时的邓秀英13岁，身高不到1米30，一根麻绳把弟弟捆在背上，一路上都是背着弟弟走的。只有休息的时候把他放下来，才能歇口气。“父亲、大哥、母亲、我、弟弟、妹妹、弟媳，还有一个姐夫哥。”邓秀英掰着指头一一数来。1935年3月，她一家八口随部队开始长征，家里只留下了一个弟弟，守着几亩薄田、三间老屋

“8个人死的死，散的散。”3岁的妹妹出痘死了，大哥在中坝一带的战斗中牺牲了，还未过门的弟媳能唱能吹，成了红军的宣传队员……到过草地前，8个人只剩下4个在一起：打仗的父亲走在前面的部队里——姐弟俩至今也不知道父亲邓心科在红31军当的是什么，只记得他“有个姓胡的秘书”；母亲则带着

姐弟俩在紧跟着部队的家属队里行军。

“红军家属多得很，每个县打面红旗。”邓秀英记得红旗上有镰刀、斧头，那是“在苏维埃见过的”。

“妈妈背铺盖，我背弟弟。”6岁的邓玉乾刚齐姐姐的腰，但体重已经不轻了。“没办法啊，再重也要背着走，要不就赶不上队伍。”母亲用一根麻绳把邓玉乾牢牢实地捆在邓秀英身上，那时的邓秀英13岁，身高不到1米30。一路上，邓秀英都是背着弟弟走的，只有休息的时候把他放下来，才能歇口气。

“你说怪不怪，那么小的娃儿，听话得很，打起仗来枪响吓死人，叫他不哭就不哭！”邓秀英扭头看看弟弟，眼里满是赞许。她的眼睛很小，但很亮。

一天晚上的战斗中，姐弟俩险些没命。“嗖”的一声枪响，弟弟头上的尖帽子打落在几米开外。邓秀英慌忙把弟弟解下来抱在胸前，趴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我捂着他的嘴，生怕他哭出来……”

邓玉乾一直侧着头听姐姐讲这些他并不记得的事，神情专注。

“草地那个苦啊，草鞋一天就走穿了，有人掉烂泥坑里救不上来，其他人就从他肩上踩过……”邓秀英眉头皱成一团，满脸的横褶中又添了几道竖纹。

最苦的是饥饿。6岁的邓玉乾枪声中没哭过，却“好几次饿得哇哇大叫”。邓秀英找到了几棵野葱，把叶尖摘下来喂给弟弟，自己和母亲吃葱根。有一次发现树丛中有些小小的红果子，邓秀英怕有毒，直到看见几只乌鸦飞去衔那些果子，她想“乌鸦能吃，人也能吃”，赶紧跑过去“从乌鸦嘴里抢食”。“你不知道啊，那些乌鸦比我弟弟小不了多少，我真怕它们饿慌了把弟弟叼走！”

“有一次，妈妈饿晕过去了。”

“我晓得，我晓得，我以为妈死了，趴她身上哭！”邓玉乾打断姐姐的话。“省事特别晚”的邓玉乾人生的全部记忆，始于母亲饿晕在草地的那一刻。“有个叔叔拿来一把豌豆面，姐姐把豌豆面喂到母亲嘴里。又过了一阵，妈才醒了……”

从此开始记事的邓玉乾并不知道全家为什么要来这个“除了烂泥和草啥都没有”的地方。姐姐知道。“我们不长征的话，肯定给杀光了！”邓秀英说。

1932年，红四方面军入川。“红军来之前半年多，父亲就不种田了。”邓秀英说，父亲荒了田地，十天半月才回家一次，听人说是外面打麻将。“妈妈和父亲经常吵架，说父亲不管家，滥赌，败家子。”

直到红军来这里建立了县乡苏维埃政权，全家才知道，“败家子”父亲是地下党员，打麻将是他们碰头联络的暗号。这时的父亲，已是陈家坝区委书记。

红军从通南巴打到仪陇、营山，父亲随部队征战，留在通江农村的全家，却忐忑不安。

土匪放话说“参加红军的都没有好下场”，邓心科那家人“要杀得鸡毛狗尽”。“河对面乡长那家，晚上一开门，全家都被杀了。”家里排行老二的邓秀英那时已经懂事，“幸亏杀完那家人天亮了，否则就轮到我们家了”。惶恐中，全家几次躲到山里。1935年，父亲终于回到通江，接全家长征。

1935年9月、10月，红四方面军八万大军在“打到成都吃大米”口号的激励下再过草地、挥师南下。南下的红军在百丈关战役失利后，渐入困境，被迫后撤。

在丹巴地区一个叫古尔沟的地方，父亲邓心科得了伤寒病。部队把邓心科放在一个挖过金的山洞里，继续北上了。临走时，给了母亲三块木板，“活下来的话，就来追部队；死了，就用这几块木板埋了”。4天后，父亲死了，什么话也没有留下。

母亲和孩子们用那三块木板安葬了邓心科，又按照老家的风俗，把柏树枝点燃插在坟头。邓秀英说，那叫“送火”。

“父亲是穿着大衣下葬的。”那件大衣是全家最奢侈的衣物，但妈妈说，让父亲“暖暖和和地走吧”。

少有人烟的川西草原，朔风夹着雪花。母子三人在丹巴迎来了新的一年，却不知新的一天去哪里。妈妈哭得呼天抢地：“我们还是追赶部队吧……红军迟早要回通南巴……”

搀扶着身体虚弱的母亲，背着走不快的弟弟，邓秀英沿着大部队走过的路上留下的宣传告示，连夜追赶部队，不料被土匪拦住了去路。究竟多少次遇见土匪，姐弟俩都记不清了。

邓秀英说，有一次，来了一路被当地人叫做“脱衣队”的土匪，把三人衣服扒光，赤条条地扔在冰天雪地里，扬长而去。幸亏路边有几具红军战士的尸体，“我们也顾不了那么多了，两三下把他们的衣服脱下来御寒”。

邓玉乾说，还有一次，他们碰上土匪剥人皮。“4个红军战士4支长枪，没有一发子弹，土匪好几十个，把战士捆在树上，用马刀从手臂、双腿开始剥皮，‘刷’的一声，就成了血人了”。“我们躲在草丛里看，吓得魂都没有了。”讲到这里，邓秀英闭上眼睛，摆摆手：“别讲了，别讲了，吓死人啊，还好没有发现我们……”

最后一次路遇土匪，就没那么幸运了。

“那天，又有一伙土匪抓住了我们，把我们带进一个看不到天的树林。”邓秀英说，“土匪还抓了3个年轻姑娘……”

邓秀英接着讲了下去。林子里，土匪让他们站成一排，来了几个买主挑人。一个买主走到邓秀英跟前问：“你会不会放牛？”她点点头，便被买主带走了。

“他们说的是当地的话，我听不懂，”邓秀英说，“他两只手在头上装牛角，还摆了个赶牛的架势，我猜是那个意思，就点头

了。”

邓秀英不愿走。“死，也要和妈妈弟弟死在一起。”然而，买主“像逮只小鸡一样”，把她拎走了。走出好远，还听见妈妈和弟弟在哭。

“母亲和您呢？”我转身问邓玉乾。

“我们就惨啰，干不了活没人买，就给扔到河里去了。”土匪端着长枪，赶着母子俩往河里走，要实行“水葬”。母亲把邓玉乾背在身上，齐胸深的冰水里站立不稳，稍一停步，子弹就在左右射起水花。紧要关头，一位路过河边的藏族老人目睹此景，心生怜悯，出钱买下了母子俩。走上岸，母亲“扑通”一下给老人跪下，磕了几个响头，然后抱起儿子失声痛哭。“我一辈子都记得那个老爷爷，”邓玉乾说，“他叫单木果。”

姐姐挨打双手严重变形，关节异常粗大，手指如同人为弯曲的盆景枝干，无法伸直；弟弟寻姐走过一个个寨子，一家三口终于团圆。

好心肠的藏族老人单木果买下了母子俩，却无力维持生活，只好把他们卖给一家头人。

“那家人对我好，有吃的。”母亲不分昼夜干活，邓玉乾则上山放牛，因为个子矮，得戴上一顶高帽子，“那样，草高的地方才看得见人”。他的藏名叫丹增。母子三人，身在两处，不知对方地点，亦不知生死。

“买主把您带到哪里去了？”我们问邓秀英。

邓秀英没有立即回答，只是把手伸到我眼前。那是两只严重变形的手，关节异常粗大，手指如同人为弯曲的盆景枝干，无法伸直，“都是他们打的！”

从一家卖到另一家，被主人取名“邢措”的邓秀英不知给多少个头人当过奴隶。“他们把我当牲口使用，天晴下雨打霜下雪都要上坡种地，稍有不是就打。”

邓秀英几次逃跑想去找母亲和弟弟，都没有成功。一天，她从一个叫广尚的头人家跑出来，刚跑不远，就被头人的儿子逮住了。他一个巴掌，把邓秀英打倒在荨麻丛里，脸上和手上顿时起了红泡。

年复一年，邓秀英在折磨、逃跑和更多折磨的循环中挣扎，而此时她的弟弟，正面临着更大的危险。

邓玉乾16岁那年，一个藏胞偷偷告诉他，主人要杀他了。当地的规矩是，外来的成年男子要杀掉，妇女小孩不杀。母亲“吓得脸都白了”，叫邓玉乾立即逃生。几天几夜，邓玉乾走到了阿坝城。想着“庙子里没人敢惹”，他走进了一个看上去挺大的寺庙。苦苦哀求下，住持收下“丹增”在庙里打杂，“冬天扫雪，夏天扯草，还发给茶叶、酥油”。

“那您是怎么找到妈妈和姐姐的呢？”我们已深深地陷入了这个家庭电影般传奇的情节。

“嘿嘿，长征的时候姐姐救过我的命，我后来又救了她的命！”邓玉乾摇头晃脑。

找妈妈不难。两三年后，邓玉乾偷偷回到自己放过牛的那家附近，趁着母亲下地干活，“拉上她就跑，一直跑到阿坝”。母亲便在阿坝城里找了个人家帮工。但姐姐在哪里呢？邓玉乾穿上一件喇嘛的长袍，在同姐姐分开处的方圆几十里，“一个寨子一个寨子地走，一家一家地找”。

“我在门外头砍柴，看见一个喇嘛走过来。咦？仔细一看，是我弟弟！”邓秀英至今还觉得弟弟能找到自己这件事有些不可思议。分别整整7年，她还是一眼认出了弟弟，“他长成大人了！”邓玉乾用最快的速度同姐姐约定，第二年庙会在寺庙见——他们用的是藏语。几年来，姐弟俩都学会了藏语，弟弟更是忘记了汉语，以至于60年代全家回到老家的时候，弟弟根本听不懂也不会讲四川话。采访中，邓玉乾说话很慢，很多词语发